律保障；五是在有效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方面，主要围绕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路径和机制展开剖析，形成了一套较完善的国家安全宣传教育体系，为实现国家安全教育全民化、常态化、规范化提供重要科学保障。

不能否认的是，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。一是既有成果在研究方法上创新不够，大多采用传统的理论阐释、逻辑推演等研究范式，深层次的学理分析或运用科学量化分析、混合研究、跨学科知识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；二是下位概念相对模糊，如具体安全领域界定不清晰、概念内涵和外延解读存在差异、不同安全要素之间的边界不明确等问题仍然存在；三是关于单一安全领域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，而以研究复杂安全问题为导向、突破单一安全领域的总体性研究成果相对不足。

未来，进一步拓展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极为重要。在理论研究方面，应坚持推进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范式创新，积极构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，持续深化各安全领域协同综合研究，加大关注新兴安全领域动态化发展；在实践应用方面，应将理论研究成果更好地转化为实际政策或制度措施，增强国家安全防范水平，提高国家安全保障能力，推动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。

总体国家安全观在中美关系中的体现

郭延军

（外交学院国家安全学院院长、研究员）

与美国陈旧过时的国家安全观相比，总体国家安全观代表的是先进的、符合世界潮流的安全理念和行动指南。其先进性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：

一是开放理念。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，更不是另起炉灶，而是通过借鉴西方先进主流安全观理念，结合我国现实发展实践和文化基础等实现的超越。特别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倡导的“共同、综合、合作、可持续”的全球安全观，契合世界发展大势，是一条共同进步之路，秉承的是一种“共进思路”（co-progressiveness）。这与基辛格提出的中美“共同演进”（co-evolution）有着本质区别。“共同演进”的基础不是基于共同价值，而是双方根据自身逻辑执行各自政策，因此有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结果：要么形成基于相互尊重的共有秩序，要么可能导致基于“丛林法则”的分裂秩序。

二是系统思维。突出体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的五对关系上：既重视外部安全，又重视内部安全；既重视国土安全，又重视国民安全；既重视传统安全，又重视非传统安全；既重视发展问题，又重视安全问题；既重视自身安全，又重视共同安全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国家安全的部分提及统筹发展和安全、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、统筹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、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、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，同时提出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，进一步强调了安全之于发展的基础性和保障性作用。反观美国，则是以“零和博弈”式的旧安全思维应对新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变化，无视全球化潮流，无视国际关系民主化呼声，无视安全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。在这种旧安全思维指导下，美国对华战略转变背后的一个重大逻辑是从市场导向转为安全导向，以维护国家安全之名行维护全球霸权之实。表现在行动上，美国以各种安全理由和非市场手段打压中国，其结果必然是撕裂安全与发展的内在紧密联系。

三是问题意识。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，以政治安全为根本，以经济安全为基础，以军事、科技、文化、社会安全为保障，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。可以说，问题领域层层递进，构建起应对错综复杂的安全问题和挑战的清晰逻辑链条和优先顺序。既尽可能囊括国家面临的重要安全挑战，又划定了国家安全边界，防止“泛安全化”问题出现。反观美国国家安全观，“泛安全化”问题严重，已经从科技、贸易等有限问题延展到人文交流等众多领域。

四是行动导向。总体国家安全观并不仅仅是理念，还体现在行动上。“全球安全倡议”的提出就是一个生动例证。继2022年4月提出该倡议后，中国政府于2023年2月发布《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》，进一步阐释“全球安全倡议”的核心理念和原则，明确了20个重点合作方向以及5个全球性和地区性合作机制，努力为各国提供平等交流合作的平台，体现出鲜明的行动导向。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也以行动为导向，主要是在“印太战略”框架下建立一系列“遏华小圈子”。然而，全球安全不应该由一两个国家说了算，西方也并非铁板一块，美国积极打造的各种“遏华小圈子”恐难取得预期效果。

五是交叉特色。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的国家安全学强调交叉特色，不但可以为国家安全学科发展提供多学科支撑，也可以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落地实施提供强有力的专业支撑。在中美交流中，美国不少从事国家安全研究的专家学科背景相对单一，对安全问题认识不够准确。在此背景下，中国国家安全交叉学科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，特别是国家安全法学的建设任务尤为紧迫。

六是世界情怀。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国家安全是内向的和自助的，应主要以提升本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为目标。但这往往带来对国际安全的挑战，因为国际安全是以构建国际体系为目标，是外向的和互助的，从而导致在自助和互助、内向和外向之间产生重大矛盾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六个统筹，可以说从理论上较好地解决了这一悖论，并将在今后的实践中日益展现其伟力。